

The Theory of Processual Sociology 过程社会学理论

原著：Andrew Abbott 安德鲁·阿伯特 原始翻译：邢麟舟、赵宇飞
更新：周忆粟

版本：2023.09.26

[译注] 本文改译自目前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版本（《社会科学的未来》，2023.6）。文中的术语与《过程社会学》以及《攸关时间》做了统一，图例和文献都已略去。

I. 导论

今天我们最终来到了魏国，也就是理论的领域。然而今天，我不再沿用《三国演义》作为引子，而是用《红楼梦》来引出讨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中有一章（passage）抓住了社会理论中过程论立场的根本。你们可能记得，在第六十六回中，柳湘莲在外游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京师。而在前一次来京时，他在薛蟠的怂恿下与尤三姐订下了口头婚约，将祖传鸳鸯宝剑中的一把留给三姐作为信物，而三姐也在千里之外一直热恋湘莲五年。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然而，当湘莲回京面临将要兑现的婚约时，他犹豫了。在与宝玉商议他的顾虑，却发现宝玉意外地对此十分冷漠后，他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贾琏。而贾琏为了躲避其妻子王熙凤的监视，正与三姐的姐姐二姐偷偷同住。三姐偷听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正如你们所知，她从自己的房间中走出，当着两个男人的面用祖传宝剑自刎而死。湘莲悔恨欲绝，在恍惚中，他被一小童领入了一间婚房，在那里他梦到了三姐。但醒来后，他却发现新房变成了一座破庙，一名跋腿道士正在他面前捉虱子。湘莲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而道士却答：「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腿而已。」

在我看来，道士与众不同的评语，正是整部《红楼梦》的中心思想。他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他在何处或他是何人的知识。所谓的「何方」，仅仅是此地和此时，一个他将从此处出发前往他处的「现在」。这意味着，这个道士自身也仅仅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此地和此时，他什么都不会留下，除了不断变动的人格所留下的一丝痕迹。没有什么是恒定的，不存在一幅「X 标记了我们处所」的世界地图，不存在一份说明我们是谁的人物名单，也不存在一张告诉我们现在是何时的行事日历。相反，只存在此地（不论此地是何地）、此时（不论此时是何时）以及经历

此地与此时的一瞬间的我们自己。即使是令人敬畏的王熙凤本人——她绝对是小说中最有权力的人物——也只如项链上的珠子，是各种事件串成的一条线，而这条线将会在四十八回之后，随着她结束自己生命的幻象而结束。金陵十二钗中的所有人都几乎走向了类似的悲剧结局，而贾家本身也会消失在废墟中，仅仅因高鹗所续的不自然的结局而免于覆灭。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就在离此处不远的地方，曹雪芹本人穷其一生，也仅仅是将其所经历的正在消失的过去重新恢复一点而已。如果我们将这个看法反求诸己，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做演讲和听演讲的我们，本身也只是前往另一所在的路途中的事件而已。

所有这些都听上去很有道家的意味，也有万事万物皆转瞬即逝的意味。那么我们如何能将这样一种过程性的观点，想象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变化的理论？还是说，这样的努力是尝试在瀑布上建起一座楼阁？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只有非常少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建起这座楼阁，因为现实就是一帘瀑布。这个推断基于如下这个简单的逻辑问题：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寻找关于社会生活的通则 (generalities)，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明显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与通则的想法背道而驰。另外，就算我们发现这种变化仅仅是一种假象，而在社会生活中似乎存在普适的规律，这些规律也无法从逻辑上解释其本身的变化。一个固定的规律体系只有经历了破坏或失败，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么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根本性社会规律中的多变性，要么就只能假设一个本身在定义上便无法解释任何形式的基本变化的社会规律体系。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变化」并不是一个固定而稳定的体系所能够偶然解释的结果。

相比之下，创造这样一种对稳定（或至少是暂时性稳定）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即，将其视为永恒变化所产生的结果。这个事实在物理学中早已不新鲜，驻波、共振和干涉图样等概念都由此产生。这些现象都属于微观结构永恒变动，但宏观结构动态恒定的系统，而且它们能够在短期内看起来十分稳定的规律。当然，当这种动态的宏观稳定性变得普遍时，我们就倾向于将它们当作真正的静态。所以，许多社会学家将动态稳定性看作一种偶尔变化的固定「社会结构」或「稳定制度」。但长期来看，屈就于「社会在根本上是静态的」这一思想倾向相当致命，因为这种屈就让我们回到了一种在逻辑上无法成立的情况：我们尝试将变化解释为稳定系统中的暂时性、决定性的结果。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上，这行不通。

这道谜题在社会学史上也很常见。在 19 世纪末经济学领域著名的方法论之争中，这是争论的核心。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主张我们应该寻找永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验经济学规律。但相反，历史学派主张这种规律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威廉·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 的描述中，这个争论成为普适与独特的对比，是「律则式」(规律所决定的) 和「个殊式」(独特研究) 之间的对比。这种「方法论争论」，如其名称所示，是关于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的争论。这个话题我曾经在第一讲中详细阐述过。各位可能还记得，我相信抽象和具体——或者以更社会学的术语描述，理论和实证——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的确，我在整个智识生涯中都不愿意在这两种视角之间做出选择。我的大学生涯从个殊式的、具体的历史与文学世界开始，但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却植根于一般认为是律则式和理论性的社会学世界。我并没有在这两种视角之间做选择，而是将发明一种包含这两种视角的社会学本体论概念作为我的目标。这种概念会将历史学和社会学，会将个殊式的学科与律则式的学科，作为这一更加一般性的视角中的特殊案例或方面。所以，我将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内，勾勒我对于社会世界真正的单位、结构与关系的想象，并且论证，这种本体论可以同时包含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

让我首先快速总结一下我的主张，从而让你们对我的思路有基本的了解。我的社会本体论从关于过程的概念开始。社会世界并不由现存的实体构成，而是由不断成为过去的当下 / 现在事件构成 (events in a present that is always becoming past)。这些事件有时被公众行动和意义关联到事件的「世系」(lineages of events) 当中，而这些「世系」组成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微观概念「人格」和宏观概念「社会实体」。不过，在过程论解释中，不存在微观与宏观。人格和社会实体不断地被社会过程重塑，它们各自被同一系列的行动和意义所创造，这些行动和意义同时产生了各种人格和社会实体作为其结果。这种同时性是可能的，因为正如我们自己处于各种家系 (family lineages) 之中，事件也可以处于各种事件世系之中。进而，正是这种世系的形成，使得开放性的当下成为封闭的过去，并从可能出现的潜在未来中创造一种新的当下。最后，这个关于事件的社会过程拥有一种「拓扑结构」，即一种对处于时间和空间中某些位置的诸事件的特定排列。这种拓扑结构的一般性质产生了人格和社会实体的许多重要特性，而我们一般会把这些人和实体当作「事物」(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它们其实是事件的世系)。

简言之，事件、世系和位置是形成我们一般看作微观或宏观的人与社会实体的亚微观元素。我们一般认为的具有层级性的级别，其实是各种事件的相互作用，它们实际上不具有层级性，反而涌现自相互作用。而如果不通过一种植根于现在的事件关系理论，我们就无法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才是给定时刻下所存在的一切 (the present is all that exists at any given moment)。

由这些基本的讨论，我发展出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法，我们可以想象出能同时包含历史学和社会学两种探究模的社会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解决两种探究模式各自的弊病：律则式社会学无法解释法则的变化，而个殊式历史学则无法将其叙事一般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主张的基本来源。关于过程和位置的主题来自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对于事件经由当下而从未来向过去转化的关注，来自芝加哥学派的乔治·赫伯特·米德、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以及尤为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来源。首先，如我第一讲所示，我的理论思想是由实证问题引领的：如何解释职业群体的演化，如何将学科人员组成与学科思想的变化相关联，如何理解知识模式的演化，等等。第二，与我从实证研究中得到的教益并行，我也从第二讲中提到的我所参与的方法论争论中得到了启发。如我们所见，这些论争最终使我得以创造一种可以使叙事一般化的严谨

方法。我从这些努力中也学到了许多。

总而言之，你们即将听到的本体论拥有一定的理论来源，但同时也具有实证社会科学和方法论哲学分析方面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从实证和方法论的世界寻找一些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本体论。这些例子能帮助我们寻找过程性本体论立场的核心——我为这种抽象性道歉。在当今的社会学中，我们这些过程论者是如梁山好汉一般的法外少数群体，寻找通往我们的道路很艰难。你们会从我关于方法论的第三讲明显地注意到我们的「法外」地位，因为过程论立场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攻击标准方法论立场在方法论哲学舒适区内的堕落的基础上。所以，通往过程论的道路艰涩而抽象，而举例则能帮助我们具体说明调和历史思维与社会科学思维的主要困难。

一则有用的例子来自关于工作和职业的社会学。想象一下所有出现在人口普查上的职业类别：这样的职业类别在美国有大约五百个，在中国应该也差不多。现在我们转而想象劳动力市场中的所有个体。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你都可以想象个体被归类在其职业之中。这看起来足够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的特点会发生变化：它们会获得新的功能，也可能被技术变化摧毁，它们可能会与其他职业融合，也可能获得新的技能并催生不同的训练方法。也就是说，职业的实际性质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所以，用 1940 年乃至 1980 年的人口普查职业类别来描述 2010 年的情况就显得十分愚蠢。

但与此同时，个体本身也在变化。2016 年的资深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和 1966 年的高中生安德鲁·阿伯特、1976 年的研究生和退役军人、1986 年刚刚取得终身教职的副教授、1996 年的教授和系主任，乃至 2006 年的首席教授和癌症病人，都是不同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可能变得更加睿智，也一定变得更加悲伤。他积累了一些资源，但也丢掉了另一些。

所以我们如何同时应对变化的职业和变化的个体呢？我们不能固定职业从而系统性地研究个体的职业生涯，因为如果这样做，职业的实际变化就会被错误地诠释为个体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固定个体从而研究职业的历史，因为职业中的个体会随时间变化。他们不仅在职业之间流动，自身也在发生着改变。这就是二元性（duality）的谜题。个体和社会结构的本质是二元的，它们是统一事态的两个不同方面。

第二则例子是关于重合的（overlap）。尽管职业和工匠群体的定义清晰，但劳动力市场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无法清晰严格地被定义。零售售货员和理货员在所有的零售业态中都等同吗？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准确区分劳动力市场中各领域的一级管理职位，尤其是当它们在不同行业中任务、管理人员数目和个体责任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如这些问题所示，在实践中，大部分职业都与大批其他职业相融合，哪怕在特定时间下也是如此。而考虑到职业随着时间的漂变（drift），职业之间的区分程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就是关于重合的谜题：社会世界中鲜有清晰的边界。

提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我们就发现了第三重困难：视界范围（horizons）问题。时间视界（Time horizon）是个熟悉的问题。假设我们寻找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究竟是

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一桩瞬时事件）？是军事动员的过程（在一周的时间范围内）？还是「巴尔干火药桶」（在几年的时间范围内）？又或是两大同盟的对立（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所有这些都从 1914 年 8 月起了作用，但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深度。

社会空间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视界范围。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场景下的事件都会受到其他社会场景中事件的影响，正如这个讲座作为一个事件，是由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北京大学在中国大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世界学术工作者的竞争性市场形塑的。这些因素都是尺度不一的社会结构，但所有的结构都在此刻同时塑造了这个事件。所以和时间视界一样，也存在空间视界。

我们也不能假设——在两个案例中都不能——这些不同的视界范围处在同心圆结构中。恰恰相反，一个给定事件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仅仅需要包含（contain）当下时刻即可，而并不需要以该时刻为中心。举一个时间方面的例子，这场讲座可以同时被以下因素所形塑：它处于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处于「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中期，以及处于你们这些听众中某些学者生涯的早期。所有这些元素都塑造了这桩事件，尽管它们并不遵循同心圆结构，但它们都包含了这场讲座的时刻。这就是视界范围的问题，以及在此之下的同心圆结构的子问题。

对于视界范围问题的讨论，使得另一项必要限制条件变得清晰起来——任何可行的社会本体论系统都必须满足这一条件。这个新条件必须被加入我们已经看到的限制条件之中，即，将世界假设为处在变化中的必要性。那么这第二项限制是，世界上不能存在距今遥远，由过去延伸而来，而仍然在当下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存在的历史行动（historical action）。唯有现在存在。理性的狡计，或者用佛教术语来说，因果报应，只能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由遥远的过去穿过当下的链条所留下的痕迹创造，这种痕迹连接了遥远的过去和现在的当下。过去业已消逝；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痕迹可以一直延续。我们铭记着许多事，而我们所处的环境记得更多。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因果都发生在现在。只有过去留在现在的痕迹可以对我们施加影响。

最后一道谜题是关于意义的（meaning），我在之前的讲座中提到了这一点，即「多义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衡量一种给定的社会特性，如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我们并不能对于这种社会特性在社会因果方面「意味」着什么作出固定的理解。或许它影响了其他的事物，如对于移民的态度。或许它由其他事物所决定，如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所处社区的宗教信仰。或许它是一个群体或宗派的特质，又或许它是一种个体的特质。或许它只关乎宗教态度，促使我们直接考量宗教实践。又或许恰恰相反，它是某种更大的态度体系，如保守主义的一种标志。实际上，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可以是这些元素中的某一个，也可以是它们中的所有，或者它们中某一些的组合。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只存在一种意义，它们都有着「一大家子」意义，但在这个家中哪一位成员才是一家之主却并不清晰。这就是社会意义多重性的问题。

以上就是一套本体论学说所必须解决的难题：二元性、重合、视界和多重性。另外还有两条基本限制：我们必须假设世界是变动不居的，非此我们无法发展出一套解释变动的方法；同

时，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因果关系看作在当下发生，因为过去显然已经消逝了¹。

II. 事件

接下来让我开始正式的讨论。

首先让我们考虑二元性的问题（在我的例子中，当认识到了个体和职业都在持续运动和变化的情况以后，问题在于如何讨论关于工作的世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两大家族，即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欧陆国家的社会涌现论²，都尝试通过矮化二元体系中的其中一元来解决该问题。根据自由主义，社会的突生事物是附加性的、不重要的。而在涌现论中，个体是附加性的、不重要的。如我之前所述，这两种方式都无法奏效，因为它们都将附加性体系中的变化误认为是其所关注的主要体系中的变化。

所以，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将两个系统的交叉部分作为分析单位。在我关于职业的例子中，分析单位必须是一个特定的职业中的特定个体。但是，由于个体和职业都随着时间变化，我们就必须附加一个条件，使得研究单位变为一个特定时刻的特定职业中的特定个体。这显然不是一件社会事物，而是一桩社会事件。十分明显，这样的事件是有效的社会本体论中唯一可能的基本单位。正如乔治·赫伯特·米德所述，世界一个事件的世界（the world is a world of events）。所以这意味着，「社会世界」或「社会」并不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是「社会过程」。

请注意，在最传统的本体论中，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个体与社会结构（在这个例子中是职业）的关系，是层级性的（hierarchical）。也就是说（根据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中习惯的秩序规则），我们认为个体嵌套于职业中，而职业又嵌套于职业类别中，依此类推直到「社会」这一级。我主张的本体论否定了这一点。个体和社会结构（职业）并不以层级性的方式相联系。它们是「共面」的（coplanar），我用这个数学术语来描述它们的关系。如果两个位置处在同一平面，它们就共面。将个体与社会结构称作共面，我指的是，社会过程是一个事物，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它：我们可以从个体的方面看待社会过程，并将他们在某一时刻的职业位置看作他们的属性；或者我们也可以从职业的角度看待社会过程，将这些职业当下的从业个体作为它们的属性。至于我们从何方面来看待它，实际上是任意独断的³。

接下来，我会将这些看待社会过程的不同视角叫作「秩序」（orders）。个人和社会结构明

¹ 这一系列的问题部分溯源于我对于标准化方法所隐含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部分我在上一讲已经讨论过。另外，它们也溯源于我对于过程性方法相关问题的零星的纯理论讨论，包括社会实体的起源（Abbott 1995c）、转折点的特质（Abbott 1997b），及时间的无限可分性（Abbott 1999b）。所有这些内容在经过些许修改后，都重印于《攸关时间》（Abbott 2001b）一书中。

² [译注] 涌现论（emergentism），也译为突生论，是一种基于涌现的哲学观点。一个系统的某种性质是涌现的，意味着它是该系统中其他性质的互动造成的新性质，这个性质是无法从原本性质中预测、推理出来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涌现论与还原论（reductionism）相对立。

³ [译注] 作者在一篇论文中详细探讨了共面的问题，参见《社会流动：是什么？在何时？怎样发生？》（“Mobility: What? When? How?” Pp. 137-161 in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Eds. S. L. Morgan, D. Grusky, and G. Fie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显是两组这样的秩序。另一组秩序是「身体」。身体与个体并不相同，因为身体作为一种物理实体，与个体人格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是一种社会实体，与身体紧密关联，但并不等同于身体（也不受限于身体）。身体与人格之间的不同，在任何有残疾或潜在致命疾病的人身上，都令人痛苦地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好像个人认知与社会人格的区别，当与故人久别重逢时，或与仅闻其名其作之人初次相遇时，也同样会表现得十分明显。

请注意，各种秩序有着不同的特点。身体是排他性的：一副身体和另一副身体完全不同。相比之下，人格并不排他，因为一个人的人格完全由与其互动的人形塑。并且，我们找不到明显的理由，来赋予一个人在没有直接社会交往时所经历的人格以某种优先权（尽管事实上我们都会这样做）。社会结构更是具有相互渗透性，因为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实体，都与其他许多社会实体有着大量的重合。我此时的演讲，并非是一件发生在某个单一社会实体上的事件，而是发生在诸多社会实体上的事件：美国人、教授、社会学家、男人、父亲等。

但另外一组秩序包含了所有符号表征。通过这些符号，我们与世界邂逅，而这种秩序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文化」（在英语中是如此）。同样的，文化与群体等社会实体的区分是足够清晰的：婴儿潮一代是一码事，而婴儿潮一代的自我意识是另一码事，正如马克思在关于阶级的问题上意味深长的论点一样。而我们也可以继续详细说明不同秩序间的各种不同之处。

关于秩序，相当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间松散地可相互区分，是不分层级（即共面的），也是独立的（即不可化约）。不言而喻的是，整个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任何社会生活都可以被化约为这些秩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的思想之上：经济学将一切归纳为个人行为，人类学将一切归纳为文化，心理学将一切归纳为身体的通则，等等。但我所主张的是一种一般性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所有上述看法都是片面的。任何特定的观点都将我们带入了一种错误的认知，正如前述个体与职业的例子那样。这种错误认知在（部分）加深我们对某些现象的认识上，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仍旧是一种错误认知。

比较各种社会科学会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另一项重要事实。从任意给定的秩序的角度出发，其余的秩序都一方面表现为限制（constraints），而另一方面表现为促进（facilities）。因此，各种专门化的社会科学并不会忽略那些它们没有选择关注的秩序，而是会将其视为外生于所研究的因果体系的「结构性自变量」。这个事实解释了最近人类学关于具身化的研究，以及经济学家最近对心理学和网络的痴迷，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研究都关注其自身学科所基于的秩序之外的毗连秩序，而这些毗连秩序组成了对该学科所基于的秩序加以限制或促进的一般性体系。所以，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传统上的重点是社会结构如何限制个体行为。但实际上，把个体的特质看作社会结构的限定也同样容易，而这正是劳动力规划所研究的重点。

秩序的概念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元性的问题，它也消除了不符合逻辑、问题百出的层级和还原概念。秩序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一种特定案例下的实证问题，因为一桩事件发生在几种秩序中的每种里面。所以，特定个体在某一特定时刻中的一个特定职业所面对的事件，就在个体和社会两种秩序中发生。如果这个职业碰巧有身体方面的体现，则也会带入身体的秩序。如果

这个事件中存在沟通和理解的需要，则它在文化的秩序中也会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秩序中没有任何一种以等级化的方式凌驾于其余秩序之上，而每一组秩序也与其他秩序相互制约。（例如，你无法仅仅让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参与工作，尽管新的移动通信技术使你得以身在曹营心在汉！）另外，很显然，每种秩序都具有其自身内部的因果逻辑，就如同流行病学学会考虑身体的逻辑，而人类学会考虑文化的逻辑，等等。

另外一个概念会对解决重合问题有所帮助，这就是公差（tolerances）⁴。公差是一种具备反身性和对称性，但不具备传递性的数学关系，一个例子是「大概一样高」。A 和 A 大概一样高，这是反身性。如果 A 和 B 大概一样高，则 B 和 A 也大概一样高，这是对称性。然而，如果 A 和 B 大概一样高，B 和 C 大概一样高，而 A 和 C 大概一样高就不一定成立，这就是说这个关系并不一定具备传递性。总而言之，公差代表任何具备反身性和对称性，但不具备传递性的关系。

考虑一个例子，即某人可以理解另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方言学家告诉我们，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至少是在当代移民潮之前，一个给定个人的语言一定可以被半径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另一个人理解，尽管他们的「官方」语言可能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住在马德里的人可以理解住在雅典的人的语言，但这意味着你可以从马德里到雅典构建一个公差链。在这个公差链上，不存在任何语言理解上的清晰界限，不论官方语言的界限如何⁵。

公差这个概念十分有用，因为尽管我们会做一些典型的假设，可大部分社会生活都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正如以上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许多清晰的界限都是由民族国家等社会实体所创造的。但正如语言和职业这两个例子所示，社会生活本身就是模糊的。请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糊性会尤为真切。当我 30 岁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与本科年代的直接联系。当我 45 岁时，我可以对我 30 岁出头的尴尬事解嘲一笑。但当我现在 68 岁时，本科年代的那个我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甚至在我阅读当年的书信和课程论文时也会这么觉得。

总而言之，社会过程由事件组成，而每桩事件都处于几种秩序中，但这些秩序并非以层级的方式相关联。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固定的层次，尽管在每个任意给定的秩序中，其他秩序会根据研究重点展示出限制或促进的作用。同时，在社会过程中几乎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公差的概念来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接一个事件之间的联系（linkage）创造了社会过程表面上的稳定性，包括人格、社会实体、文化对象乃至身体表面上的稳定性。的确，身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⁴ [译注] 见《过程社会学》第八章。

⁵ [译注] 此处作者借用了语言学中著名的「方言连续体」的概念，即在分布于一个广阔地理区域的诸多方言中，地理位置极其接近的方言间差别微小，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不同地区方言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作者在此处的说法大致正确，但或有夸张。在欧洲，五十英里范围内的居民的语言互通大致可以在各语族内部实现，如在罗曼语族内部的意大利（意大利语-北意大利语）——法国南部（奥克语）——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地区。但在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希腊语族等语族的分界线上似乎很难实现。在近代以降的数百年中，随着工业革命、城市化与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语言互通变得更加容易。

例子。身体在不断地代谢自身的化学成分，而其中各种器官的细胞都在以令人无法忽视的速度进行更新换代。血细胞仅仅在几天或几个月内就更新一次，而脂肪与心脏细胞则以更缓慢的速度更新。但整个身体的细胞结构的更新则是较为稳定的。然而，这个自我再生产的系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留过往疾病的记录和大量交错的记忆。

我们所知道的人格、状态、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等现象，都由类似的、随时间发展并且相对持续的联系构成。但也有许多并不稳定的联系现象不为我们所知，因为我们的文化系统围绕着识别出稳定的而非转瞬即逝的事件而组织。例如，一系列求婚活动曾发生在芝加哥大学方庭中央的长椅上，而我也（毫无疑问）是成千上万在这长椅上向心爱的女子求婚的男人中的一员。鉴于求婚者相近的人员构成，他们的教育、年龄、社会地位，以及长椅围绕一个中心点的摆放方式，这样的求婚甚至具有了一种特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我们无法把这个世系转化为一个事物，它一直是一系列转瞬即逝的事件构成的序列（也就是说，这个序列是由一系列非常暂时性、几乎昙花一现的事物所组成的）。

事件之间的联系有两个宽泛的种类，即体悟（*apprehensions*）与力迫（*forcing*）⁶。这是我从怀特海处借鉴的术语。体悟包括看待、认识、知识、名声等。与之相对的，力迫包括限制、决定和结果等。如果我们考虑「创造一个职业」这一事件，其中体悟可能对应于一群人认识到他们在以相同的方式做相同的工作，而力迫则可能对应于为这群人安排一次会议来创造一个协会或一份期刊。

一个事件可以被定义为某些体悟和力迫的交织（*knotting-together*），并形成有特定结果的事物。这个事物会发出信号而被「别人」体悟，并产生因果效应被人承担或接受。也就是说，事件并非如我最初所举的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完全是简单的事态，即一个特定个体在一个特定时间的特定职业的位置。在发生的意义上，它们是事件。我不会对此做更多的赘述，你们只需记住，这个交织的过程倾向于将社会过程稳定为一段恒定的事件世系，这就是我们一般认为是社会过程基本单位的人格和社会实体。

我需要强调的是，与个体人类器官相关的世系，其表面上极大的稳定性来源于任何人体中都存在的强有力的记忆与意识对世系建立过程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社会组织如这所大学一样，有着分散的记忆与意识，所以它远比人格更加漂浮不定。但与此同时，它们有着个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它们可以在某个特定的身体死亡后延续。

III. 地方性

迄今为止我为你们解释了秩序和共面性，解释了重合与公差，也解释了事件与联系。我现在即将碰触我论点的最后部分，即产生常见社会理论所假定的表面稳定性的世系现象。但进一

⁶ [译注] *apprehensions* 在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目前的三份中文译本中分别作：杨富斌译本，理解；李步楼译本，掌握 / 洞察力；周邦宪译本，领悟 / 理解。

步深入讨论世系这一概念之前，我需要为你们提供一个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

一个给定的事件相比于某些事件更接近另一些事件，我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假设。即使在股市上的几纳秒之内，也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接近市场。事件之间存在不同的距离，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可以讨论事件的「位置」(location)⁷。当然，我们首先的倾向是为社会空间假设一种笛卡尔式的维度系统，其中时间是第四个维度。你们当然可以这样做，但这只能应用在我之前提到的其中一组秩序之上，即关于物质实在的秩序。我们将会看到，对于社会时间和空间，笛卡尔的方法在逻辑上行不通。

但还是让我们从笛卡尔空间中存在的物质实在开始。笛卡尔空间不存在逻辑问题，但物质实在在时间维度上仍然存在微妙之处。时间不仅仅是第四个维度，因为我们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得知，时间存在一个相对于物质事件的方向。时间不仅仅是一种次序 (order)⁸——从一个角度来看是 ABC，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是 CBA。时间是不可逆的，它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永远运动的维度。

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相当不同的属性。第一，过去和未来都不可以如现在一样被直接体悟。只有通过它们（对于过去而言）在现在留下的痕迹，或（对于未来而言）由现在所代表的对它们的预测和计划才能被体悟。第二，未来无法发出力迫性的联系，而过去则已经发出了力迫性的联系。第三，只有现在可以发出新的体悟性或力迫性的联系。这三个事实通常可以总结为，在物质实在的任意给定的时刻中，都只存在当下。过去在物质性的当下留有记录与痕迹，但除此之外它就不存在了。当我们再次发现过去的一些事物，并将其当作一种力迫性联系来作出反应时（例如当我们发现一份丢失的遗书，而它将财产留给某人时），这个事件是在当下发生，而非在过去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逻辑上其实不能说「《儒林外史》的作者生于 1701 年」。吴霖起的确在那一年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尚未成为这部著名小说的作者。类似地，未来也在当下存在一些痕迹，即大量的预测、希望和梦想。但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些当下的梦想，而非未来本身。所以，事件并不仅仅是一组事件的顺序。时态现象意味着牛顿时间中的每一个绝对时刻都是从与未来相关的属性开始的，然后会具有与当下相关的属性，最后会具有与过去相关的属性。

由于只有当下存在，所以所有表面上由历史过程造成的影响——不论是过往的阴魂，还是理性的狡计，所有这些 19 世纪西方进行过深刻思考的历史主义事物——都必须通过即时性当下的接续来实现。所以，当下世界的物质、社会和文化结构必须包含过去留下的任何记录，因为这是记忆的唯一途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即社会时间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既然社会结构决定了当下各种人物互动的概率，那它就是「记忆」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定方面是如何得以穿过这个永恒的迭代——其中未来变为现在而现在又变为过去——却在此过程中并不发生太

⁷ [译注] 参见《过程社会学》第四章。

⁸ [译注] order 这个词在本文中同时有秩序以及顺序 / 次序的含义。

多变化。

我将这个问题称为历史性问题 (the problem of historicity)⁹。对于有数学背景的人来说, 这个概念可以和傅里叶变换问题类比, 即不把一个长时间序列表示在时域中, 而是将其表示为单个时刻的一组调和函数的加权频率。在社会生活中, 成功的历史性的最明显例子来自物质身体。今年 26 岁的人数自动决定了下一年 27 岁人数的最大值。又例如, 由于这种历史性, 我们可以得知, 1918 年后整个欧洲女性的独身率都增加了, 这是因为大战几乎杀死了所有潜在能成为其丈夫的人。其他类型的历史性远为更复杂, 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社会过程中我们所希望理解的主要实证现象。

要理解历史性, 我们必须细致地考察通路 (passage) 这一现象¹⁰。通过通路这一过渡, 刚刚逝去的过去创造出新的现在, 而新的现在转而又成为新的刚刚逝去的过去。这种考察从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一个事实开始, 即不同事件之间两两的距离不同。现在, 我们暂时将这种距离视为社会空间中的距离, 而非社会时间中的距离。

一桩给定的事件离一些事件比另一些事件更近, 意味着我们可以思考事件所处的邻近区域。这种邻近区域代表了一个「此时此地」的集合, 而这些「此时此地」则是能够涵盖整个「现在」的公差。

用一个比喻在这里会有所帮助。我会用围棋棋盘来解释我的论证。我们只关心棋盘上的线。请不要考虑围棋的对局和棋子, 或者如何创造双眼, 或者其他因素 (没错, 我的确会下围棋, 但围棋对局本身在此并不相关, 我们只关心棋盘)。

所以, 想象一个棋盘。我们将其当作一幅关于事件的图表, 其中时间由左向右递进。每一条纵线都代表一个牛顿时间的现在时刻, 而这条线的左侧都是其过去, 右侧都是其未来。每一条横线都代表一组事件世系。所以一个棋盘上有 19 个世系, 分别有 19 个牛顿时刻。每一条横线上的 19 个交线节点代表着 19 桩事件。

再假设棋盘的纵向维度代表社会空间中的「远近距离」。如我所述, 处在绝对当下的事件之间的距离总是存在不同。围棋棋盘为这些不同的距离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把纵线之间相隔的 [其它纵线] 数目加上「1」当作事件世系之间的距离。棋盘的左上角如图-1 所示。

< 图-1 >

现在考虑事件之间的联系。棋盘已经有了横线, 棋盘上的横线代表者事件世系中一个事件与下一个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簇穿过棋盘从左向右的箭头。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图-2 所示的情况。

⁹ [译注] 详细讨论见《过程社会学》第一章。

¹⁰ [译注] passage 在米德的著作中也指时间的消逝, 变化, 同时也有章回段落的意思。

< 图-2 >

但现在我想要加入另外一组联系。假设每一个事件都对其相邻事件世系中的下一个事件有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整个棋盘的对角线都填满，并从每个事件出发都分别构筑一个指向位于其之上的事件世系和位于其之下的事件世系的下一事件的箭头。在你们脑海中应该已经填满了所有交叉点之间的对角线，我们也就得到了图-3 的情况。

< 图-3 >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可以想象，一个围棋盘上所有 361 条线之间的空格都被呈字母 X 状的箭头网格填满。这些箭头或指向右上，或指向右下。每一条横线现在都是由 19 个从左到右的小箭头组成的序列。现在你们要进一步，改动这个棋盘。我们从横线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填满了棋盘上所有的对角线，但我们必须将纵线全部擦除，因为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影响在当下绝对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因果性的发生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时间，尽管这个时间可能极短。这是我们假设事件之间有不同「距离」的必然结果。

< 图-4 >

所以现在棋盘上已经不存在纵线了。现在，一个给定事件世系上的「事件」，是由对角线箭头和横向箭头之间的交点来标记，而非由纵向箭头和横向箭头的交点来标记。你们可以想象一个由 19 条横线或横向箭头组成的棋盘，而其中每一条横线都被 18 个从左到右的 X 状小箭头网格互相分隔。所以，在棋盘上从左向右存在 19 个纵向的（即同一牛顿时刻的）事件世系，而每一个事件世系都从一个事件开始。除了棋盘顶端和底端，每一个事件都发出三个箭头，一个指向本事件世系的下一个事件，一个指向位于其之上的事件世系的下一个事件，还有一个指向位于其之下的事件世系的下一个事件。（顶端和底端的事件世系仅发出两个这样的箭头，其中一个沿着自身的事件世系，而另一个分别指向位于其之上的或位于其之下的事件世系。）

类似的，第二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事件都会接收一个从其自身事件世系发出的关联，一个从位于其之上的事件世系发出的关联（如果存在的话），和一个从位于其之下的事件世系发出的关联（如果存在的话）。连续的事件点从左到右分布在棋盘上，代表一个个连续的「当下」。除第一个时间点外，每一个时间点都拥有一个「之前」的时间点；除最后一个时间点外，每一个时间点都拥有一个「之后」的时间点。

这个模型中隐含着假设，即每一个时刻或（音乐中的）节拍都相隔着一个规律的时间，所以每一桩事件世系都在同一个时间点经历一个事件。这个假设绝非必要，只是能够方便我们进行想象。

请注意，这个比喻性的棋盘已经包含了事件「邻近区域」的思想。通过允许相邻事件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影响一个事件世系，我实际上已经断言，任何事件世系的一步邻近区域是其相邻事件世系，而两步邻近区域是其两端各自的一个相邻事件世系，等等。请注意，邻近区域在时

间和空间意义上都是「现在」的，而在这里时间和空间等同。对于每一个事件世系来说，它在时间上的一步内可以影响的事件世系，也同时是其在空间上相邻一步的事件世系。所以，时间和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等同的。通过选择一个事件可以在一步内影响到的「距离」，我们为时间和社会结构构筑了一个「比值」。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比值，同时仅仅知道当下的社会结构，我们就可以构筑一个当下的时间结构，反之亦然。

同时也请注意，邻近区域是一系列的公差。「位于同一个邻近区域」是一个具备反射性和对称性，但不具备传递性的关系。另外请注意，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围棋盘上只有一条纵线存在，也就是说，在社会分析中，我们需要用社会结构来推测时间结构，因为我们并不能真正看到时间结构，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也拥有一个位置。我们只能看到「当下时刻的社会结构」。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时间和社会结构是等同的。

我们自己在棋盘上拥有一个位置，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向上移动到顶端，而我们的某个朋友可以向下移动到底端。但我们之间所传递的消息一次只能穿越一个世系。如果你位于系统底端的朋友报告了他看到的某件事，而在你收到消息的那个（牛顿）时刻，他所见的情况可能已经改变了。换句话说，在消息传到你这里的期间，他自身的情况可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在写纸质信件的时代都非常熟悉此事。我们给一个朋友写信抱怨某事，但当你得到回复时，这件烦心事早已解决，而你又有了新的麻烦，而你朋友的回信已经和这件新麻烦不相关了。

这种不同时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牛顿意义上的当下——即物理事件的一瞬——的确是普适且绝对同时的。但因为力迫与体悟从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需要时间（而这是因为事件之间的「距离」各不相同），所以社会的当下绝不可能绝对实时。另外，「不存在同时性」这一点是对称的：你的通信者很可能如你认为他延时一样，认为你也发生延时。因此，社会性的现在真正具有一个牛顿意义上的持续期间。社会性的现在不是瞬时的，而毋宁说是「厚重」（thick）的。这绝对是社会空间 / 时间的一个根本性的特质。社会空间 / 时间并不具有任何瞬时的现在，它有一个厚重的现在。棋盘的高度正象征了这种厚重的现在。

但这还不够。正如一个假定的牛顿时间中当下的事件之间的社会距离为社会性的现在提供了厚重性一样，事件之间的社会时间也为社会空间提供了一项类似的属性：社会空间同时具有时序（order）和一种与时态（tense）等同的元素¹¹。通过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轻易看到这一点，试想在一座古老的非网格状城市的路网中从 A 开车到 B。由于单行道、建设活动、交通拥堵和其他类似因素的存在，从 A 到 B 所需的事件几乎从不会与从 B 到 A 的时间相等。这种非对称性说明存在一种对社会空间的纯指代性（indexical）考察方式，即一种通过特定个体的当下视角来认识社会空间的考察方式。这种视角对不同的个体来说是不同的，不管是关于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还是关于它们到第三个个体间的距离。所以，当我们问「从这里到那里需要多长时间」时，一幅欧几里德意义上的地图帮助并不大：你必须知道其路程的方向。所以社会空

¹¹ [译注] 参见《过程社会学》第四、第六章。

间存在一个可以与时态类比的特性，我将其称为「位态」(disposition)。位态是那些定义了一个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当下「所在地」的体悟与力迫的结合。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社会空间的考察方式，即取所有这些位态的平均值——从 A 到 B 所需时间与从 B 到 A 所需时间的平均，等等。而这个平均社会「距离」可以和「时序化」的（似乎也是可逆和瞬时的）时间相类比。我们可以将这种考察方式称为「地点」(place)。在以上的例子中，地点很可能等同于欧几里德意义上的驾车距离，但当然，在社会空间的一般情况下，欧几里德意义上的驾车距离并不存在。

对于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这些简化版本，即「地点」(对应「位态」)和「时序」(对应「时态」)，都分别是笛卡尔和牛顿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得以发明的基础。但它们都是发明出来的概念。在现实中，社会空间存在位态，而社会时间存在时态。

所以，我们有了时序性的和时态性的时间视角，也有了地点化和位态化的社会空间视角。请注意，这些考察方式都是关系性的 (relational)。「关系性」的意思是，在每种视角中，事件的意义都由其「邻近区域」决定。在时间的意义上，这意味着社会时间存在「叙事性」。它不仅能以叙事的方式被讲述，这不言自明。它的组成方式更是叙事性的 (constitutionally narrative)：是力迫和体悟定义了新事件，而它们都只能从先前事件中产生。这些之前的事件根据定义处在这个新事件的时间邻近区域中，因为只有处在时间邻域的事件才能在当下向过去的即刻流逝中「触及」这个新事件。所以，社会时间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叙事性。简言之，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昨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身边）的事件的函数。类似地，社会空间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在地性」，因为根据定义，力迫和体悟必须来自社会空间附近的事件。再简言之，发生在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事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发生在其邻域的事件的函数。（请注意，这意味着邻域的定义很宽泛，而且其中包含了对社会过程的实证考察中的大部分重要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对于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中的社会「位置」的分析，这个分析建立在「社会空间中的事件之间存在不同距离」这一公理性论断之上。由于一个世界中事件之间的不同距离是物理意义上的，即牛顿意义上的，而非社会意义上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关于社会距离远近的概念，也发现了社会时间和空间在什么意义上是等同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观念加入关于规则和共面性、关于重合和公差以及关于事件与联系的概念之中。所有这些概念对于完成过程论的主要任务都十分必要，这个任务就是解释为什么社会过程在如此大的规模上都显示了表面的稳定性。这就是关于世系的问题。

IV. 世系

我们已经碰触了世系的开端，现在是时候正式开始对其进行考察了。我已论证过，由于只有现在存在，所有过去对现在的影响，都必须通过过去在现在留下的痕迹来施展。如果我们观

察到了一种看似由长期历史力量决定的现象，这就说明过去的痕迹一定在以某种方式被不断地再生产，循环往复，因为社会过程的迭代已经超出这个「过去的致因」一开始出现时的初始当下了。

这个再生产过程具有三种宽泛的载体。第一个载体通过外于社会过程本身的秩序出现，即人格、社会结构和文化。第二个载体通过社会过程中或多或少有意的记忆过程出现。第三种载体通过社会安排和邻近区域这些简单事实出现。

我们从最简单的外部路径开始——我将其称为物理和生物的历史性。物理环境，不管是已建成的还是未建成的，都具有其自身的记忆逻辑。我在芝加哥的住宅有 120 年的历史，而其空间安排、设施和维护要求，都向其历史上住客的生活提供了大致稳定的促进或限制作用，而这只是因为其物理性质保持了相对稳定。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城市的物理结构由物理世界的巨大惯性维持，其定居者仅仅在其中起到了很小的帮助。但是这个物理环境对于其定居者来说，有巨大的决定性作用。

类似地，尽管我自己没有付出过任何努力，我的身体有对下列事项的相当可靠的记录：我得过的所有重大疾病，我孩提时代的营养与照料情况，以及我许多的社会经历，包括性接触以及所接触的社会与环境方面的病症。它也包含着一个真正巨大的收藏库——记忆。当然，最后这些（身体的记录和记忆）也是其他两种其他社会过程中的秩序的一部分：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化框架与文化结构所记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在社会过程本身的力量与活动之中，如讲故事、回顾财务交易等。然而，我大脑的神经机制对于形成这些记忆是必要的。这个机制促进或限制着它们的形成，并通过将它们集中在同一个位置，对于维护这些记忆起到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物理与生物的持久性为社会过程带来了相当一部分历史一致性，它们不会受到社会过程的影响。但个人的记忆有效地将我们带到历史性的第二种一般类型，这种类型由内生于社会过程本身，而非简单通过其他秩序再生产的逻辑生成的记忆构成。感知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过程有意记载的：被写作、印刷、归档、总结、概要，等等。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事物，而其中许多在我们需要时都无法通过索引和算法完全准确地获得。

比如，我房中有大约四千本书，用写作的方式记录了至少两千人的思想，这些人的生活范围遍布整个有记录的人类历史。这些东西是由印刷它们的物理载体的绝对耐久性自动保存下来的。但它们只有在我阅读或翻阅时才能转为鲜活的记忆。它们是一个保存过去对现在的潜在影响的巨大蓄水池，但它们只有在当下我作出行动时才能变为真实。

书籍和其他记录形式利用了纸张和类似媒介的历史持久性——这种持久性正在随着我们步入更易摧毁的电磁媒介时代而快速改变。所以这些记录形式彰显了物理历史性的社会运用。但也有整个一套文化系统涉及到用对话的形式记录过去：如传统、口头史诗、专业和业余的历史写作等。当然，过去是如此的广阔，甚至所有的这些都远远称不上能涵盖过去的一切。正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主张的，更重要的是，确实存在大量的集体记忆。但我们有

必要注意，就算是如此大量的记忆，也并非直接可用。想要让这些记忆在当下产生实际结果，它们就必须真正被再生产：它们的语言要被记住，概念的改变要被编码，而过去的意义和语境要被重新唤起，所有这些都必须发生，我们才能开始理解这些保存下来的材料的可能意义。我们总是需要这种元史学，而这种元史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切断过去与其发生的时刻之间的联系，并在当下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理论十分依赖这种第二理解历史性的方式，尽管它们通过制度的角度——即非过程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本体论。这就是社会变迁理论的「文化转向」，它从根本上将符号文化 (symbolic culture) 理论化为了人类制度的宝库。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结构过于制度化、过于固定不变、过于缺乏想象力。文化可以解释稳定性（这是文化转向学者从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中借用的论证），而同时也可以提供新奇性和变化性。但在福柯的观点中，充满了隐含的制度性假设，而文化转向也并未逃脱制度的框架。所以，文化转向成了制度框架未能认识到「是稳定性而非变化才是社会过程中需要解释的核心问题」的牺牲品。反过来，这些理论也未能认识到历史性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同时也是最微妙的）载体，我将其称为编码 (encoding) 的过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编码仅仅指的是下列在实证上可观察到的事实：在社会生活的不间断的迭代过程中，某些社会结构似乎保持者不变。也就是说，编码仅仅是一个逻辑上必须存在的过程的简单名称，以便我们观察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但逻辑同时也告诉我们，并不是社会结构具有某些规则使其得以进行自我再生产，才导致了这种保持不变的现象。否则，变化的唯一真正途径就是打破这些规则。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的模式就将长期保持停滞，只是间或才会被总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打破。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是，持续存在的微小变化，有时是定向的（漂变），有时是停滞的（制度化），也有时是从一个模式中脱离，但又马上落入新的松散的模式中，而这些新的模式也同样会漂变。

所以，编码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持续的微小变化下，仍能有产生相对静止的机制。存在集中产生这种模式的再生产模式，比如伴有微小变化的冗余重复、连锁变化的恒定规律（这在两党政治体系中最明显）及温和的层级制度。通常，编码是通过一组社会结构连接成一个宽松的网络而形成的。在这个网络中，每一个部分都松散地支持着其他部分的存在，而要产生中大的变化，则必须要所有这些部分都同时出现故障。

该现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核心家庭的文化建构。在几乎整个 19 世纪末，核心家庭的现象都与当时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地位标志联系在一起。而在 20 世纪，它也和其他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如离婚禁令、已婚女性在劳动力中的缺位，以及在女性缺乏对避孕手段的控制的前提下发展出来的性活动行为规则。但后面这三种稳定因素都在 20 世纪背景下悄然变化。到了 1970 年代，当它们都完全完成改变时，作为一种「普适性文化现象」的核心家庭突然快速瓦解，尽管专家和公众都认为它几乎坚不可摧。关于纯文化角度的社会变迁理论就到此为止。一旦所有阻碍变化的结构性力量都同时被消除，文化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就失去了防御力。

但就编码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对于我们讨论编码时所需要的所有抽象概念而言，乃至对于所有涉及保持编码的文化可见性的抽象概念而言（在核心家庭的例子中，诸如情景喜剧之类），编码最终通过松散地维持一种现象所对应的成千上万的微小日常行动而发生。比如，在我的大学和其他大学，都不存在关于如何组织课堂的准确规定。老师们都在课堂上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有些会点名，有些不会；有些记住了学生的姓名，有些没有；有些为他们自己布置的论文打分，有些不会；有些会提到当下发生的事件，有些不会。这种多样性令人咂舌，而使得这所大学维持在看似稳定状态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并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充斥巨大多样性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最终会在加以平均后，或多或少导致一个被叫做「课堂」的事物的再生产。只有当新的课堂行为系统性地席卷许多老师时，才会有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上好一节课。比如说，当许多老师开始教授身份政治，仿佛身份政治成为了一门严谨、可验证的学问时，课堂立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这个改变，过时的、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论点在课堂上变得普遍起来，而美国学者的智识生活也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改变。但这个变化只会在地地方性行为与更大的运动统一起来时才能发生。否则，随机性的微小改变反而会供其他事物锚定，尽管这类改变可以与「稳定」现象中的大量漂变兼容。

这种编码可以被想象为一张巨大的网，它由持续发生的行动和微小变化组成，而这些行动和微小变化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新的当下。这张网深刻地形塑着谁人与谁人谈论着什么，以及何人与何人做了什么。时不时的，沟通及共现的革命可以重新塑造这些联系，但联系的新模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明晰，并稳定下来。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就必须要使沟通的变化与许多连锁的、脆弱的编码机制排列一致，并使一些行动者能够看到以新的、不同的方式重新联系各群体的潜在可能。我们在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s）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到这一过程，其中政治行动者们采用早已存在的政治统合方式，稍微将其重新安排一下，然后将政治世界排列为一种看起来新式但却稳定的政治安排。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这种行动的例子，而它们在短期内的成功或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前的各种编码机制的脆弱程度，以及进行重新安排的行动者如何能够聪明地将新的持久的联系揉合在一起。但重要的是，在这些微小的日常安排中，在社会结构中，在各种地方性的和一般性的大量文化要素中：在所有这些之中，过去被编码成当下，并成为行动的根本条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过去才能影响现在，并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在稳定下来。而十分遥远的历史性行动并不存在。

编码、有意的记忆以及物理和生物的历史性结合在一起，就强大到足以产生长期历史力量和遥远历史之外的行动的表象。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举过一则合适的例子，但想要证明这三种历史性真的能够产生这种表象，是一项远远更长期的，也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工作。但我的分析已经说明了，略有重复的过程所组成的松散链条就已经足够产生这种表象，尽管这些过程同时也为决定性的行动留下了大量开放性的可能。

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的再生产都时时刻刻发生，所以过程论为行动留下了巨大的开放空间。的确，在过程论中不存在「结构与能动的问题」。能动者面对着当下的各种限制和促进条

件，但在他们可能做的所有事当中，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选择做的事。他们不会被涂尔干意义上的内化规则或马克思意义上神秘的「生产关系」所「束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被自己和其他行动者关于社会的真实信念，以及各种真实的社会行动所围绕。但如果他们可以想象某些使得这些信念与行动自我瓦解的行动，就可以自由地采取这样的行动。[信念与行动]分布式的冗余重复会使这个过程变得困难，但不会阻止它。

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详细阐述我的观点，即为什么人格会形成强大的世系，尽管很明显，在本质上人格是一种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利用了人类个体身体内存在的限制和促进机制，来产生一种混合结构。这种混合结构，部分是身体，部分是社会性自我。它相比于组织、类别、友谊团体、产业、宗教和其他社会实体，有着很大的竞争优势。它在社会空间这既不显得庞大，也不分布广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远比其他这种社会实体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尽管这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并最终消失的代价之上¹²。

人的身体从其出生开始就积累社会经验，而人格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正如许多心理学家所主张，逐渐形成的人会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事物，将这些事物与其自身建立联系，并且——如果使用 J·马克·鲍德温 (J. Mark Baldwin) 的著名术语——要么通过内在变化适应 (accommodating) 外界，要么将外界的某种变化形式融合 (assimilating) 进一个变化远更缓慢的自我。每份新的经验都要么变成自我的一部分，要么变成由自我修饰的一部分，或是被自我拒绝。这个过程当然会受到身体的限制 (我很遗憾没有一副可以让我成为短跑运动员的身体)，但身体也在提供限制的同时提供了机遇，使得曾经是负担的个人特质也可能最终变成优势。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成功地把自己注意力持续时间短的问题转化成了「极大的创造力」这一优势。

社会实体本身——比如一份学术期刊——远更清晰地展示了社会世系得以维持的真正机制。比如，在写《美国社会学杂志》的历史时，我得以知道，这份期刊的编辑、作者和审稿人都在不断地将新事物编织进期刊的世系，并去除和拒绝了其他事物。该刊物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份宗教期刊，并且这一特色至少维系了三十年。与此同时，周遭环境的变化也常常赋予它其他的特色。比如，它并没有选择评估年轻教授取得终身教职这一功能，但这是一件它现在无法逃避的事情。一支世系是一个持续进行这类编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着编织的工作，并呈现出不同的限制和促进作用。这份期刊看起来像是一件存在了 120 年的单一事物，即几矮擦期刊杂志。但事实上，它在这 120 年中具备几种相当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性，而这些特性实际的连续性，甚至比这些期刊的物理外观更加脆弱稀薄¹³。

¹² 关于个体的这一论点的初步论述，见于 Abbott 2005c。

¹³ 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参见 Abbott 1999a，第三至第六章。

V. 结论

最后，我希望指出过程性方法的一些主要优势。首先，它避开了社会理论所面临的许多传统问题。它不会受到「逻辑上无法解释变化」的致命批评。它并不把历史性力量具体化，而是将其看作当下社会结构中可分析的安排。它不存在结构与能动的问题。它不假设「结构性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结构化」(structuration) 或任何其他神秘的现象，而是使再生产成为在当下的流逝之中的一组特定的可能规律，从而使再生产成为一项实证问题，而非一项神秘的术语性问题。它可以解释偶发的大变化，以及持续性的小变化¹⁴。

第二，现在已经发展完善的社会分析都可以轻易地被看作过程性方法这种一般性分析的子案例。历史学构成了对特定世系的追溯，这些特定世系通过连续不断的当下所构成的迭代网络而产生特定的结果。经济学研究社会过程里特定空间中某种尤为稳定的（同时也是严格执行的）文化规律如何起作用。实证主义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则研究一些系统，在这些系统里，社会实体世系被文化规律和强制性社会结构强迫纳入了严格的再生产过程。诸如此类。很显然，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需要更一般性的分析。而且，具体说明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更一般性的分析，也确实是详细阐释一个一般性的过程论解释框架的基本任务。但一般性的分析一定隐含在这些内容之后¹⁵。

第三，过程性的解释框架强迫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社会分析中所认定的主要实证问题。例如，它强迫我们认识到并为社会结构和个人的二元性变化建模。我们再也无法写出一份以「职业永远不变，不同职业之间的相对比例也永远不变」为基础的讨论社会流动性的文献。过程性的解释框架也强迫我们认识到清晰社会边界的缺乏，并放弃这种对于社会边界的错误假设所带来的数学上的便利。通过坚持我们应将定位长期和短期的先行事件的方式以不同的办法被编码进厚重当下的社会结构，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不同时间视界难题的理论工具。这与我们传统上解决时间视界不同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如我在上一讲中所述，传统上我们叙述「致因」时，会遵循从长远到晚近的顺序。

这些实证分析层面的变化幸运地与科学方法论的趋势相吻合。不论我们自己的选择如何，过程论正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科学分析的一种一般方法。大规模计算能力已经使得许多基本的过程性研究技巧得到普遍应用。大规模模拟、实时因果分析，以及不断更新升级的预测方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结合海量的实时人口数据，这些技巧第一次使得对于社会生活的严肃过程性分析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这些老派社会科学家没有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支撑，我们最终会发现，这个理论将会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学者已经广泛使用的方法的抽象转译版本出现——这类现象时常发生——而实际上这些学者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几乎一无所知。

¹⁴我目前关于过程性方法的总体陈述，参见《过程社会学》Abbot2016f，一书。这本作品汇集并修订了过去的一组论文，以便形成一个对过程论立场连贯的——如果不是公理化的——阐述。其涉及的早年论文包括 Abbot2005a、2005c、2007a、2011a 和 2014c。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又汇集了一组类似的论文，旨在阐述社会过程规范性的方面，这些论文包括 Abbot2005e、2007e 和 2016d。

¹⁵这个论点在《过程社会学》第三章中有详细阐述。

相比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传统因果分析，未来的社会科学可能会更像天气预报。天气涉及云层、风暴、锋面等暂时性现象。它涉及诸多的时间尺度，从日间温度变化，一直到几个世纪的气候变迁。它涉及多种极为详细的信息，以及多样且相互竞争的模拟过程。在此之上，它最终也需要持有一种美学视角的专家来对其进行诠释。这类方法在社会科学数据的商业分析中已经十分常见，我们自己也应该开始运用它们。

最后，我想要指出的是，过程论也意味着社会科学写作体裁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形式化分析的修辞框架，是一种将各种原因分开阐述，并赋予其独立权重的框架，而这种框架在过程论的语境下几乎没有意义。无论如何，该框架在西方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对一种法律上可行的不平等「社会学」的需求而驱动。这一任务就要求建立一种幼稚简单的因果关系观念，使选民和政客都能理解。对于这样的因果性叙事而言，过程论会用世系构筑的历史来进行替代，正如我自己在关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专著《学系与学科》中所做的那样。类似地，当下时间的因果性的核心重要性，意味着生态决定的核心性，这隐含于与我的《职业系统》有类似内容组织的著作中。过程论中关于空间范围的问题，意味着两种体裁的对话。其中第一种体裁，即当下的民族志的体裁，捕捉到了一组世系在某个时刻的全部内部复杂性，我将其称为「抒情社会学」。而另一种可能是一种并置式的体裁，它将截然不同的社会案例整合进一个对话之中，但这个对话并不能被外加的理论所解释。这就是我托名芭芭拉·赛拉伦特所著的一系列文章的体裁¹⁶。

有了这个体裁列表，我总结出了一种看似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现在让我回到刚开始的讨论，即关于《红楼梦》第六十六回的讨论。我是否在强烈地主张我们应该像柳湘莲一样，放弃这虚幻的生活，并积极地追求道家所称的长生，外于人间烟火，就如宝玉最终所做的一样？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尽管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世界的旁观者而非创造者，但我们的目标是理解社会过程。而想要理解社会过程，就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让我来做一种我认为是非常反传统的诠释吧。

在我看来，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在《红楼梦》中所扮演的角色群体并不是贾家，而是那些旁观、维持且偶尔挑战贾家的人，而这些人到最后比贾家活得更长久。对一位来自西方的读者而言——这本小说我现在已经读了五遍了——这个群体的核心例子是花袭人。她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位中心人物，而她并不属于精英阶层。她是宝玉的大丫鬟，但除了第六回中初试云雨情外，她并不是宝玉关注的中心。纵观整部小说，她往往是这个充满激情与缺乏节制的世界中那道冷静而明智的声音。她也是小说中最后一个退出舞台的中心人物，而她在 118 回前就出场了。固然，由于在宝玉失踪时没有自杀，袭人被贬入了「又副册」。曹雪芹并不欣赏她，且批评了她在道德层面的懒惰。不，袭人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自杀，所以她只能继续活着，并嫁给了另外一个见证了贾家衰落的外人蒋玉菡。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更加勇敢的选择。可能只有袭人——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理

¹⁶关于抒情社会学，参见《过程社会学》第四章。如前所述，芭芭拉·赛拉伦特的系列文章收录于《多样化的社会想象力》(Abbott 2017b)。与这一论点相关的其他规范性工作，包括 Abbott 2016b 和 2016e。

解了第一百二十回道士甄士隐对不明白的贾雨村所说的那句话。甄士隐说：「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他在「人文学科的事业是幻境」这一点上很正确。在「由于这是我们唯一的事业，所以它必须是真实的」这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人之为人，正是要加深、拓宽乃至或许改善我们的幻境。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活下去。也许这就是这部小说中假与真的无尽纠缠的真谛。也许这也是过程论理论无尽地寻找着下一美妙幻想的终极意义。今天下午在此处的每一个人，的确只是前往另一处所在的路途中的一系列事件而已。

.....或许，我们也是时候上路了。

甄士隐